

从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到中国特色《中国经济学》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的若干思考

李文溥

摘要: 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体系,编写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经济教材,必须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分析和批判。本文对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甚大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这是一个伪科学体系。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务之急,不是急于构造理论体系,而是脚踏实地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非科学的观点进行彻底的理论清算。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概念、范畴,一步一个脚印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后,才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国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8402(2006)11- 0004- 06

—

根据我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理论创新,对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进行学理研究,确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是中国经济学界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学术发展建立在对以往研究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体系,编写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经济教材,必须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分析和批判,分清其中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

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早在65年前,以王亚南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曾大力倡导“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身体力行,写下了一批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力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等。但是,1952年起,我国引进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53年发表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由斯大林主持编撰,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

作者简介:李文溥,男,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称《教科书》)就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范本。

由于实践的限制,毛泽东同志没能提出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整体系。但是,已经明确指出:“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并要求我国经济学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写出中国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可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没有编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者通过对改革开放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对价值规律、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劳动价值论等的讨论,大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持,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提供了许多咨询建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学理论发展,是建国以来最快的。经济学研究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承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者编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据说有数百本之多,但是教材的理论体系却大致雷同。这些教材的一个共同缺点是,还没有从被毛泽东同志批评的《教科书》体系中摆脱出来。理论体系,仍然大致沿用《教科书》,许多范畴、概念仍然照搬《教科书》。

二

评价《教科书》,涉及实证科学的问题是:《教科书》对苏联社会经济现实进行了客观分析么?根据《教科书》理论体系,能否科学地预测这个社会发展趋势?

1954年版《教科书》(下)的基本内容包括:

- 1.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
- 2.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
- 3.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及其运行。
- 4.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

其中,核心部分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及其运行。

《教科书》的逻辑思路是:首先论证存在着一个“客观经济规律体系”,而后指出国家是认识和利用规律的惟一主体,通过对全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占有,国家能够而且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科学地组织、领导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以致共产主义。^[1]

我认为《教科书》体系的理论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唯心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论”。

宣传唯心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论”是《教科书》一个重要特征。

长期以来,肯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客观经济规律一直被认为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这个观点不能成立。第一,它忽略了前因: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取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并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狂热之后,苏联才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客观经济规律,认为苏维埃国家是一个能够“消灭现存的经济规律,并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规律’”的机关的说法。^[2]第二,它忽略了斯大林提出这个观点的真实用意。斯大林在肯定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之后,立即指出“社会在法则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法则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并驾驭它们”。苏维埃政权在利用经济规律方面有特殊作用。^[3]《教科书》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国家是利用经济规律的惟一主体,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起作用的客观的经济规律,是被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认识和利用的。”^[4]在《教科书》中,凡是提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的场合,主体无一例外地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或“苏联政府”。它实际上想说的是:存在着客观经济规律,但是,只有国家知道并可以运用它。这样的“客观经济规律论”,显然是君权神授论,目的是为国家统制经济制造理论依据。与其说是唯物论,不如说是唯心论。

因此《教科书》所阐述的“经济规律”,基本上以服务国家为目的,呈现出典型的规律主观

化特征。它们或是论证国家行为的合理性,或是国家认为应该的、希望看到的事情。《教科书》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有两个规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规律和价值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提出的。《教科书》援引前者,目的是论证在苏联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与准国有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恰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相悖。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在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之前,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更何况国有化!”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这已经被包括苏联在内的实践证明。而《教科书》的观点是:不论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是否存在着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否存在着社会化的大工业,只要掌握了政权,都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只要实现了国有化,就进入社会主义了。这样的论证逻辑,与其说是承认生产关系变革应当与生产力性质、发展水平相适应,不如说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典型的惟意志论;至于后者,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不存在的,斯大林实在是无法在苏联经济中消灭商品,只好承认价值法则存在,但是却宣布“价值法则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5]

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劳动生产率提高规律、按劳分配规律,更是《教科书》杜撰出来意在于证明国家经济行为合理性的主观“规律”。所有这些“规律”之所以产生,仅仅因为生产资料国有化了。然而,生产资料国有化至多只能证明国家有权支配这些生产资料,却无法证明国家能够合理地支配这些生产资料。所谓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斯大林的主观规律”,^[6]从理论上说,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并未提供真正实现按劳分配的社会条件,在苏联,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从来不是按照按劳分配原则进行的。^[7]劳动生产率提高规律实际上只是国家希望出现的事情。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其说是客观规律,不如说是价值判断。它是否合理,我国经济学

界至今似乎没有提出质疑。^[8]比较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本质差别。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道义论,主要着眼于人的解放与自我实现;而斯大林的基本经济规律,具有浓厚的古典功利主义色彩,基本上是边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翻版,甚至更为退步。基本经济规律强调“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用“整个社会”替代了“最大多数人”。在斯大林体制下,“社会”实际上是“国家”从而官僚阶层的同义词。即使在“社会”是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意义上,基本经济规律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有本质区别。基本经济规律实际上把劳动仅仅视为谋生手段,因此是负效用,而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之一,人的全面发展、自我实现的主要内容,从而否定了自由劳动对实现人的生命价值的伟大意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充分显示了斯大林的思想境界从未超出庸俗资产阶级的眼界范围。他实际上也和资本家一样,否定劳动者在生产领域的主权和社会需要: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者对自主劳动的权利与需要,把人简单地视为“消费人”,把人的社会需要及其实现狭隘地限制在生活消费领域,用可怜的消费者主权替换了自由人在健全的社会形态下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使劳动者异化为畸形的“单向度的人”。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使作为社会价值判断标准,也应当予以否定。^[9]

(二)所有制崇拜

所有制崇拜是《教科书》的另一个特征。

《教科书》所描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劳动生产率提高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之所以形成并发生作用,前提条件是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看是否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实行了农业集体化”,1930年,社会主义成分已经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切杠杆。这就是说,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10]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

力性质规律的要求是否在苏联实现,取决于是否在全社会范围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11]价值规律之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是因为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巩固的。”^[12]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城乡利益的对立消灭了。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对城市的憎恨一点影子都没有了,……长期存在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对立消除了。……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在苏联的绝对统治,是苏维埃社会的精神上政治上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些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赖以发挥的经济基础。”^[13]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不存在着剥削;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收入必然是按劳分配的,等等。一句话,只要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忽略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将生产关系简化为所有制,认定国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如恩格斯所批评的,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这种“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崇拜论,充分体现了《教科书》在国家面前的“十足奴才习气”。

(三) 国家拜物教

制造所有制崇拜,目的是宣传国家拜物教。《教科书》的作者似乎是权力万能论者。获得权力的基本方法是控制全社会的政治经济资源。国家既然已经控制了国家机器,如果再控制了全社会经济资源,它就无所不能。因此,在《教科书》所介绍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个国民经济就只剩下一个主人:具有完全理性、无所不能的国家,它决定着一切。^[14]

与此同时《教科书》十分强调国家的最大化能力,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能够通过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合理地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社会的物质资源

和劳动资源,能够有效地避免资本主义那种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社会性巨大浪费;能够自觉地保持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协调,从而使社会再生产能够按比例地持续地高速度发展,等等。

《教科书》塑造了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国家。为了证明国家的神奇力量,甚至不惜伪造统计数据。^[15]

《教科书》宣传惟意志论,鼓吹国家拜物教,醉翁之意在于宣传斯大林,从理论上为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推波助澜。《教科书》竭尽全力想完成当局交付的任务:用生花妙笔从经济学角度对最高政治领导人政治经济实践进行肯定性图解。但却适得其反。它对国家那种毕恭毕敬、顶礼膜拜、毫无批判的态度,使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人都难以相信它能以客观的态度对苏联社会经济现实进行经济学分析,它只能使人想起马克思的名言:“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6]《教科书》在塑造了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国家的同时,也留下了自己的形象: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是神学谦卑的婢女而已。自亚当·斯密以来,如此匍匐在政治权力面前的经济学还是绝无仅有的:它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政坛的风吹草动,毕恭毕敬地以吏为师,亦步亦趋地调整所谓“理论”,全无自我,全然不顾科学的逻辑,学术的自尊。这是一个除了领袖、当今政要之外,没有任何经济学家的经济学;一个除了领袖思想、政府决议之外,没有任何经济学家建树的经济学;一个只有今天,没有昨天的经济学,一个连今天也无法确定的经济学。^[17]

(四) 伪科学的基本特征——辩护性

《教科书》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使命定位为从理论上对斯大林——之后是当令

政要——政治经济实践的肯定性解释,使教科书从诞生之日就丧失了科学最基本的特征——客观性,具有了伪科学的基本特征——辩护性。辩护性使《教科书》根本无法正视社会经济现实,它既不敢正视斯大林时代苏联经济运行中的诸多内在矛盾,^[19]也不可能揭示这些社会经济矛盾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势,因此,必然对这个体制的运行和发展趋势缺乏基本的理论预测能力。这个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为主线,分析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理论体系煞费苦心地“论证”了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的经济形态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可是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据说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苏联在《教科书》出版40年后竟忽然解体,斯大林创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被抛弃。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教科书》这个伪科学体系的巨大嘲笑。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曾经存在过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

三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国计划经济建立之初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问题,并指出关键问题是编写者的方法论不对,“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本本上没有说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构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经济学界所面临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将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而

这个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当前,首先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因为,“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19]

应当承认,即使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还非常短,实践极为有限,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较为成熟、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困难的。因此,当前的当务之急,不是急于构造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是脚踏实地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个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非科学的观点进行彻底的理论清算。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素材,找出众多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概念、范畴,一步一个脚印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体系,建设中国经济学,之后,才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我们的使命是伟大的。我们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地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脚踏实地,面向实践,认真研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我们的目的是一定可以达到的。

注释:

[1] 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在苏联建成。“苏联具备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所必须的一切条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社会主义并正在顺利地建设着共产主义的国家。”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99、612-613、671页。

[2] 始作俑者是党政官员H.沃兹涅先斯基。见特里福诺夫、希罗科拉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7页。H.沃兹涅先斯基并不因此倒霉,相反,宦海得意,年纪轻轻就位及副总理,一度曾为总理候

选人。

[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明确指出:社会是由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90页。

[4][10][11][14]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43-444,393,395,443—445页。

[5]厄内斯特·曼德尔认为:这实际上是商品拜物教+国家拜物教,是思想上的完全混乱,在实践上导致了经济领域的严重失调。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6]胡培兆:《“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并不存在》,《中国经济问题》1986年第1期。

[7]卡德尔指出:在苏联,上层官员的工资比工人的平均工资高15倍,比机械制造工业中工人的最低工资高54倍。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论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年版,第38-39页。在名义收入分配差距如此之大,实际收入分配差距更大的情况下,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仍然决议:“必须彻底消灭工资方面的腐朽的平均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亦持此说。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68、492、494页。

[8]樊刚指出,在我国,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中,“谁都没有想从根本上否定或修改‘苏联范式’中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和逻辑;除了个别文字表述之外,事实上也没有人对‘基本规律’的定义或提法提出根本性的修改。”樊刚注意到基本经济规律其实是价值判断而不是客观规律,但是没有注意到其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值得商榷。见樊刚:《“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9]批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需另文专门进行,限于篇幅,这里只是提出问题。

[12]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8页。

[13]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3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15]尼·尼马斯洛夫:“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及其实质”,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1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

[17]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1955年版总结的斯大林诸多理论贡献,到了1959年的修订第三版,就大大缩水了。1955年版中引用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语录在1959年版中统统被删去,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并且成为被谴责的对象。1959年版中大量引用的赫鲁晓夫语录,后来也落得同样下场。

[18]毛泽东同志指出:“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王亚南:《王亚南文集》(一至四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特里福诺夫、希罗科拉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3]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版。

[4]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爱德华·卡德尔:《卡德尔论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年版。

[6]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7]康春林编著:《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8]陈爱玉:《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比较》,《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9]周新城:《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随想》,《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

[10]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陈燕)